

# 当AI入侵艺术创作的操作系统

花晖

“人工智能已入侵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这是《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对于AI迭代之迅猛而发出的感叹及忧虑。赫氏素来以演化生物学家的角度阐释人类历史,当过往的“AI威胁论”集中于智慧机器奴役或灭绝人类,赫氏则认为今天的AI具备了操纵及生成语言的非凡能力,出现“会讲故事的计算机”无疑将成为人类史的一个拐点。

考察AI艺术创作领域,这种“入侵操作系统”的状态已初现端倪且迅速蔓延,那么机器语言将如何影响人类的创作思维及美学表达?在人机交互的系统框架中,各自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 词元生万物是语言的进化还是退化

赫拉利认为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而正是通过改变语言表达的习惯与构成,AI得以“操纵”人类观察及思考的方式。换言之,“硅基生命”正尝试从根本上瓦解并重塑最顶端碳基生命的文明累积系统。

赫氏的一系列观点显然将AI视为入侵物种而怀有“敌意”,但语言这个极为重要的符号系统出发,思考AI与人类文明的现时及未来关系,确是一条新颖而有效的路径。

不妨由“提示词”开始我们的讨论。但凡对AIGC稍有接触,便不会对文生图、文生视频感到陌生。想象一下在文本框内输入蒙娜丽莎、立体主义两则提示,AI送出的极大可能是毕加索版的神秘微笑,你当然还能额外获得波普版、水墨版乃至黏土版。文本驱动是AI创作的最基本形式,由此看来,AI对人类最直观的“操纵”在于那些连续的、高度依赖上下文的语义表达,由断裂、跳跃的语素、词、熟语等语言单位直接完成了,且完成的形式在情境的逻辑性、完整性上日趋合理,并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一种机器创意。这就导致一个悲喜难辨的结果:当我们语义表达的概念拓展至艺术创作,过往那些引以为豪的丰富经验、刻苦训练、入微观察、情绪峰值,都在体量尽可能缩小的音义结合体面前,显得性价比很低。随着提示词工程师成为职场新宠,9块9的AIGC课程充斥网络,人工智能显然带来了“6·18”般的创作狂欢。

那么回到语言的讨论范畴,基于提示词的“操作系统”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在AIGC的语言模型中,“词元”这一翻译代表着机器以数字形式来读懂人类词句的最小语义单位。提示词中的长文本经由“分词”步骤拆解为词元,并通过嵌入、位置编码等一系列处理,由物理世界

的非结构化数据转为机器可理解的结构化向量,图片、视频等多模态输入的最终目的地也是多维向量。

暂不展开复杂的技术机理,而用蚂蚁搬家的故事来理解一下词元的无穷力量。一只蚂蚁承载负重,兜兜转转大半天回到蚁穴,而当成千上百集体迁移时,却能惊人地依据地形选择出最便捷、最合理的行进路线,路遇急流亦会抱作一团滚入河中,通过牺牲少数边缘个体而获得蚁群的胜利。这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智能爆发被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非称为“涌现”,而一旦突破聚合的奇点,宇宙起源与生命演化都在涌现之列。

词元就像一只蚂蚁,当我们投喂足够的语料给大语言模型后,由表及里涌现而出的是AI对于提示词中潜藏的艺术风格及情感倾向,产生了识别、理解以及“想象”——假设我们意欲为“一键生成”添加一些拟人的色彩。同时于规模法则之下,随着模型尺度急剧增大,其计算精度呈现出昂然上扬的幂律曲线。正如OpenAI从未将Sora简单地等同于视频模型,而是野心勃勃地称其为“世界模拟器”,当你察觉到墨镜女郎镜头下的反光时,吃嘴与现实间的界线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

表面上看,多模态提示词代表着创作界面的全然改头换面,而背后的词元万物,体现出机器对艺术世界新阶段的理解与掌握,更是人类在新一阶段对艺术思维的形成与表达,创作工艺的更新与再造产生了颠覆旧知的认识与行动。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前不久全球首部AI大片《我们的终结者2重制版》上映,故事背景设定为ChatGPT一统天下的未来世界,OpenAI派遣机器人穿越时空刺杀人类反抗军领袖山姆·奥特曼,也即是现实中OpenAI的创始人,整体情节与经典科幻片《终结者2》形成了呼应。撇开影片中部分影像细节的不到位,其制作本身便掀开了电影工业的新篇章。项目启动于好莱坞编剧大罢工之际,在传统电影技术岗位缺失的前提下,50名AI艺术家利用ChatGPT、Midjourney、Runway等五花八门的AI工具,完成了50个彰显个人风格及工具特性的影像片段,整部大片由此“拼凑”而成。这样的“草创班子”在3个月内完成了编剧、导演、场记、美术、配乐等所有标准工业流程,证明了AI在降低使用门槛的同时,带来了跨学科、跨门类的通用智慧。

若将语言范畴由艺术创作的技法与规律,再度拓展至认识宇宙世界的运行真理,这种通用智慧则令人惊叹。DeepMind旗下的AlphaFold于数年前,已预测出100万个物种超过2亿个蛋白质的结构,几近涵盖地球上所有的已知蛋白质,而今天的AlphaFold 3已将预测范围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生物分子。显然AI在各个领域对于帮助人类认识自身,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那么人类又该如何可持续性地向AI相处?



AI作画(作者提供)

点,正如跳跃的提示词,将由AI填补创作的空间。又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由商汤科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参与研发的首个人体扫描大模型SMPLer-X。得益于450万个实例的数据训练,样本视频中人体姿态的多样性、局部动作的复杂性,都能被快速且高质量地识别并提取出来,这意味着CG制作展现出了另一种崭新的未来。

由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41年《铁扇公主》启用转描技术算起,逐渐肇绘、惯性测量、光学动捕等一系列方法都离不开巨大的人力物力,而AI生成式动捕摆脱一切传感器,在摄像头、手机乃至网络视频中直接采集获取动作数据,在大幅削减成本的同时,着实降低了制作人员的工作难度与强度。

在这样的创作伙伴关系中,艺术家们理应承担鼓舞,去尝试过往不曾有过的想象,去攀登过往不曾达到的峰顶。顶尖AI科学家李飞飞宣称AI的胜利不能仅仅是科学的胜利,而必须是人文的胜利,这意味着AI需要成为“遵循优良的学术传统,愿意协作,尊重他人的意见与专业的机器”,这亦为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筑起了一道倚重AI革新且可持续发展的防火墙。

在现时的答案中,过往的“工具论”显然不合时宜,AI不再是辅助导演完成分镜、帮设计师生成草图的简单机器,一种相互补充与激励的“伙伴论”是良好的起

点,正如跳跃的提示词,将由AI填补创作的空间。又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由商汤科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参与研发的首个人体扫描大模型SMPLer-X。得益于450万个实例的数据训练,样本视频中人体姿态的多样性、局部动作的复杂性,都能被快速且高质量地识别并提取出来,这意味着CG制作展现出了另一种崭新的未来。

由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41年《铁扇公主》启用转描技术算起,逐渐肇绘、惯性测量、光学动捕等一系列方法都离不开巨大的人力物力,而AI生成式动捕摆脱一切传感器,在摄像头、手机乃至网络视频中直接采集获取动作数据,在大幅削减成本的同时,着实降低了制作人员的工作难度与强度。

曲艺,是凭借口头语言、以“说唱”为主的形式进行叙述的综合性民间表演艺术。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重要类别的曲艺,传达着知识、文化、社会价值及集体记忆,其在保持活形态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海地区的曲艺,有许多至今仍任当地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中自然传承,并呈现出较强的存续力,其中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广泛流传于农村地区,而独脚戏、上海说唱则受到都市民众的喜爱。这说明它们与民俗生活相连,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均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能力。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地区的曲艺所代表的地方传统具有相当强的适应环境变化的潜能,其自身不断做出调适,拓展演艺空间,与主流价值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话。它们在演出市场中的运营策略,或许可以解决其他民间表演艺术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 上海曲艺类非遗与民众日常生活

在上海,曲艺类非遗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被上海民众所传承,同时也表达着民众,建构着社会,钩沉着上海城市记忆。它们在当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其讲述活动与当地生产、生活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相生相融。

宣卷、锣鼓书流行于上海浦东、青浦的农村地区。几百年来,其讲述活动能够传承延续主要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得益于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长三角一带以稻作为主,稻作文化对该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地方信仰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由于水稻丰歉与气候等自然因素关系极大,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民众多将丰收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对一些地方神灵的崇拜,企盼通过祭祀,并在仪式时宣卷或锣鼓书,从而向天地、佛佛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安康等。这种信俗在长年累月的积淀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当地代代相承的文化,规范和约束着一代代民众的言行,承载着人们的民俗心理和集体记忆。随着时代变迁,这种信俗的外在表现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核却始终留存,历久弥坚。

水稻耕作有农忙和农闲时期,农闲时民众不必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便趁农闲寻找娱乐活动以慰藉自己的辛劳,宣卷、锣鼓书遂成了当地社会传统的精神娱乐项目之一。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河流湖荡使得交通阻隔,在机械动力和交通尚不发达的阶段,民众出行极为不便,与周围城镇很少有沟通,而环境的闭塞使得这些曲艺讲述传统一旦形成之后便更能持久保持。虽然后来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与周围城市的交流日渐增多,各种现代、主流的娱乐方式也逐渐影响到了乡村,但扎根于当地民众心灵深处的传统却一时难以改变。

宣卷、锣鼓书这类曲艺保留着原始艺术所固有的实用的、复功能的、艺术一功利的特质,在其讲述过程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展演处于艺术与生活之间,自当地民俗社会中产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影响了当地民俗,逐渐演变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节日、人生礼仪、做社等各类场景中,都必不可少,已发展成为当地特有的生活相。

上海曲艺类非遗与城乡文化建设

曲艺类非遗不仅活跃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它们对上海城乡文化建设也有着积极意义,部分曲艺特别能够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是乡村振兴中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从事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独脚戏、上海说唱等行业的艺人,他们既是曲艺讲述者,又是“文化专家”。民众深深依赖他们的视觉和口头表演所传达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准则,不论年长还是年幼的民众都在其讲述中受到教化。艺人通过讲述民间故事、笑话、时事新闻等来灌输道德观念、方言俗语等,并在重复多次的讲述中使这些观念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注意到这种社会灌输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他曾于19世纪30年代评论道:“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下层阶级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或至少得到了更好的训练。”在上海都市和农村,即使是部分识字较少、阅读能力较低的民众,也能够通过艺人的讲述获悉国内外新闻时政、熟知妙善公主积德行善的修行故事、商秀英杀狗劝夫的贤良故事、张四姐为救夫婿大闹东京的真情故事、包公秉公执法的故事、侦查英雄杨子荣英勇剿匪的故事等,并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对民间性的历史、民族与国家的认知。

诸如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这类植根于农村的传统曲艺,保留了当地原始的言行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的文化要素,包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其中有大量劝人为善、劝官为清的传统剧目和保家卫国的新编剧目,有助于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宣卷使人们享受着纯说唱或表演艺术无法带来的精神慰藉。结婚、拜寿、乔迁新居等喜事时宣卷,使忙于工作的一家人能够有机会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为家庭祈福的活动中;在农村中,一家请宣卷,亲戚邻里都来聚餐、听卷,庙会时更为热闹。宣卷表演为当地民众聚会和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场合,即使是有矛盾的家庭双方也可借此机会解开心中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诉求,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和谐安定。总之,这类曲艺承载着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精神特质,其讲述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将成为乡村振兴不竭的源泉和永久的动力。

传承中推陈出新的上海曲艺类非遗

当代,许多曲艺类非遗都将面临失传,或者极少在日常生活中演唱,而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传统曲艺依旧能够以活态形式持续展演。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曲艺表演活动受到的外来影响增大,演出的市场需求有减少的趋势,但他们能够巧妙地接受这些外来影响并与其融合,根据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推陈出新。

上海说唱艺人龚自康年轻时下农村、下工厂,采用上海说唱的艺术形式,即兴发挥,唱工厂先进事迹、唱时政新闻、唱百姓生活,迅速与观众打成一片;近几年,又巧妙利用独脚戏经典曲目《金陵塔》的节奏特点,进行改编和创新,在说唱作品的过程中尝试融入一些Rap元素,以增强对青年观众的吸引力。青浦宣卷艺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转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成立宣卷文艺宣传队。青浦商榻文化站曾组织以宣卷为主的宣传队在全乡巡回演出两个多月,受到村民欢迎。新时期,宣卷表演不断创新,为迎世博、新农村建设和创建了大量剧目,这些新编宣卷很好地宣传了政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新冠疫情阶段,艺人们创作多部短篇宣卷用于防疫宣传工作,宣扬正确的防疫措施。宣卷由于贴近村民生活,形式活泼,受到广大农村民众喜爱,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书间道

# 重回中国古典小说的讲故事传统

——读周游的《麒麟》与《钦探》

战玉冰

在流行着各种魔幻故事、科幻想象与“设定系”的当代文学场域中,历史小说写作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意?历史提供给写作者的是更广阔的虚构空间,还是“戴着镣铐跳舞”?或者反过来,历史小说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是营造一种历史真相的幻觉,还是在“史实”层面之外,触及某种更本质的真实?而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的说书、讲史、历史演义等文学形式又能够为当下的历史小说写作提供怎样的滋养和助益?

新生代作家周游近两年创作的《麒麟》与《钦探》,似乎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样本。

## 于历史的细微处入手

从乾隆年间“麒麟降世”的祥瑞传说,到明朝中后期的“土木堡之变”,周游的《麒麟》与《钦探》聚焦不同历史朝代,但又努力避开正面书写历史大事件,而选择于细微处入手。比如《麒麟》从隐姓埋名的陶钧及其身边等一众人物关系出发,徐徐展开一段所谓“虫草”“八字”与“命运操纵”的故事情节。《钦探》更是让主人公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才接手调查战败原因。其调查对象,也并非什么权臣名将,而是更多聚焦于边防戍卒、“夜不收”乃至厨师。这种通过历史缝隙切入,借助小人物写大历史的方法,好处在于容易在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效果。一方面,小说中大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整个故事的背景和框架有着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来做支撑;同时,故事里很多具体而微的场景、器物、服饰、餐饮也都是真实的,在细节处给读者营造出某种真实感或历史幻象。另一方面,小说的主要人物、行动和故事却也都是虚构的,这就为作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自我表达留足了空间。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史与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有着“文史不分家”的倾向。一方面,历史构成了小说书写的重要题材和对象,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说书

书讲史,或者历史演义。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看,小说在古代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补”正史之“阙”的内容。而无论是讲历史故事,还是写历史小说,都具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重要功能,这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古代小说家对自己文字的真切寄予。同时这也正是作者周游如此看重历史小说写作“内蕴”的原因,他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发挥“寄托”之功能,并打破我们一般对于所谓“雅俗文学”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芽突”获奖作品《李自成》《白门柳》《张居正》等严肃文学,到高阳、二月河等人的当代通俗历史小说,再到《绍宋》等网络历史小说,甚至如《步步惊心》《新宋》等穿越小说,本质上也都是历史小说的写法。向历史深处不断探索,构成了当代历史小说作者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周游的这两部作品也可以放在“历史小说”这一略显宽泛的文体中获得理解和认知,而不拘泥于所谓“雅俗”之别。

## 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与“读法”

对于在历史大事中塑造小人物的写作手法,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马伯庸就堪称这方面的高手。而马伯庸与周游小说之间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善于采取某种类型小说的框架结构来写作历史小说,比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之于反间谍小说,《两京十五日》之于逃亡冒险类小说等,而周游的《钦探》也采取了典型的侦探小说调查结构。

但与一般现代类型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小说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叙事更加散漫,情节更为跳跃,他的小说可以从任何一点枝蔓开去,然后层层叠叠,甚至完全脱离原有的情节主线而在开头另辟一个全新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在刻意以某种反类型的方式来挑战类型叙事常规。比如在《钦探》中,朱抗、张绍祖、田朔三人组成了主角调查团,读者开始一定会以为朱抗才是查案的主力,但作者在情节展开过程

中却“出人意料”地安排他杀人未遂、被捕入狱,失去了查案的主动性,反而后面大量关键情节都是由张绍祖和田朔祖两人来携手完成。甚至于像《钦探》中王第三这种典型的反派高手人设,作者在花了大量笔墨写其越狱逃走,一路和主角团拼杀而终于重回到瓦剌之后,却又轻而易举地将其“处死”,给人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

大体上来说,周游并非从现代西方类型小说中获得滋养,其所继承的更多是中国古典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比如《麒麟》中情节的跳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章回小说常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钦探》开场写张绍祖之醉酒,反衬出朱抗的高度自律与警觉,也可以在金圣叹批“水浒”时提出的“背面铺粉法”中获得理解;而同样是在《钦探》中,先写主角团在徘徊镇追击瓦剌骑兵(其中有一个骑兵就是王第三所仿装的),后又写主角团困顿不舍,一路追击越狱逃走的王第三,正是所谓“正犯法”——即从不同角度反复写同一类型的情节,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我们或许在中国古典小说,而非西方现代小说的传统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周游小说的独特质地。其看似散漫的情节其实是一种对古代“说书”或者“讲史”中故事结构的模拟。

与这种小说写法相适配的,是周游小说中古今杂糅的故事内容,与带有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前者突出表现在《麒麟》中的“麒麟”设定。所谓“麒麟”,表面上是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祥瑞降世”,或者是寺庙里的威武雕塑,但实际上却是西洋传教士巧夺天工的技术发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为“瑞兽”的麒麟当然是一种来自于前现代的文化想象,而葛理天和保禄所造的“机械麒麟”也并非乾隆年间西方所能实现的技术水平,而是一种带有蒸汽朋克风格的科幻奇谭。而这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奇幻与科幻的交织与碰撞,构成了小说中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这一处理,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荡寇志》中将公孙胜斗法与西洋发明家白瓦尔罕发明沉螺舟并置的写作策略。

后者所谓“明清白话韵味”的小说语言风格,则贯穿了从《麒麟》到《钦探》两部作品。周游在小说中通过说书表演,不断篡改并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文本嵌套关系——赵敬亭的“说书”既改写同时也表现了某些小说中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作者周游何尝不是在扮演另一个层面上的“说书人”角色,甚至在《麒麟》最后,周游巧妙地借用“仿托之作”和颇有意思的“叙述性诡计”意味的手法,再一次颠倒了“故事”与“故”事(过去发生的事)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带有后设意味的小说结局。

总的来说,周游的这两部小说与其说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不如说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从题材内容、叙事手法到小说声口,《麒麟》与《钦探》都更多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但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周游的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补”正史之“阙”,而是通过小说反过来质询所谓历史的真相。这一点在《钦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借助调查真相的侦探小说叙事框架,最后抵达了历史没有真相这一所谓“真相时刻”。具体来说,小说中主角团经过一番辛苦的调查,最后却将“土木堡之变”的原因追溯到皇帝吃饭时被一颗石头砸了牙。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查案结果并非是一种解构历史的虚无主义冲动,而是试图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真相的复杂,宛如蝴蝶效应般所关联的巨大因果链条网络中,每一个小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历史的走向。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周游小说在古典外衣下真正现代的地方。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 扎根乡土,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传承

——上海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因素探析

黄亚欣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